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

吴肇华 著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研究丛书

朱小蔓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 / 吴擎华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0

(陶行知研究丛书)

ISBN 978-7-5336-6229-5

I. ①陶… II. ①吴… III. ①陶行知(1891~1946)
—教育救国—思想评论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6018 号

书名: 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

作者: 吴擎华

出 版 人: 朱智润 策划编辑: 杨多文 责任编辑: 杨多文 徐宝妹
责任印制: 王 琳 装帧设计: 袁 泉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51) 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229-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在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战士陶行知先生诞辰 12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的五位学者潜心研究陶行知思想的作品。我作为一个教育学者,一个学陶、研陶的理论工作者,为五位作者高质量的研究感到十分欣喜,为出版社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感到由衷地欣慰;同时,也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自改革开放之初(1981 年)为陶行知先生平反以来,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许多热爱他、敬仰他的人们,写了一系列陶行知思想研究的理论作品、大量的学习心得和纪念文字。这些精神产品给人们认识 and 了解陶行知先生一生的伟大抱负、一生的伟大功绩、一生的理想信仰和主张,展现出日渐深入、全面而细致的图景。这次选编出版的五本新著,是一项开掘性很强的学术成

果。五位著作者思想更解放、思路更开阔。他们不拘泥于原有的角度和材料,也不满足于原有的结论,均有新的视角、新的眼光,也发掘出一些新的资料,向读者展现了在过去的时代情势下较少表露出来的陶行知先生鲜为人知的思想和故事,体现出学术创新的勇气。五本著作视角新颖,各有新见,我相信一定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使读者对陶行知先生的了解更具多面象,更加真实、丰满,更加可敬又可亲。

随着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陶行知思想研究组织,我国陶研系统不断发展壮大,并日臻完善,开展的活动也日趋丰富与活跃。各地陶研组织通过设立各种研究性课题、举办宣传活动、建立遍布全国的实验学校、开展广泛的教师培训等多种活动,使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伟大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尤其影响了广大工作在基础教育战线的教师们。实践证明,榜样和思想的力量是强大的。今天,中国的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相当多的人对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师范教育、平民教育、全民教育思想,对他的教育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追求给予高度认同,并在工作过程中认真学习和实践。

30多年来,虽然学界和实践界对陶行知思想的学习、传播已经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但是,客观地说,陶行知思想迄今仍然没有成为指导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它尚未发挥出其所应发挥的作用。还有相当多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并不熟悉甚至几乎不了解陶行知思想。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显著增加,大部分学校的物质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相比之下,更加健康、清晰的教育理念并没有为人们所掌握,思想性、观念性的障碍依然不少。教育的民主化进程虽然不断进步,但进步的幅度和成效仍不能让人感到满意。如何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办教育,如何真正按照教育的内在规律办教育,仍然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十分期待有更多的人热爱并潜心陶行知思想的研究工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愈是基础的开发性研究,后人据此可进行持续性地进一步研究,并不断运用于实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就愈大。

目前,我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经济文明协调发展日益被提上日程。推进教育的民主化进程,促进教育界自身的思想解放,全面、深入地理解教育现代化发展内涵变得更为迫切。教育民主化并不居于物质条件的进步,也不仅仅是制度的安排和设计,它更是一种民主的精神、尊

重的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陶行知先生说：“遵照民主思想从根本上重建学校及学制，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民主不仅是医治中国疾病的‘盘尼西林’，并且是注入的鲜血，是给中国人民新的生命力，去创建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因此，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现代化思想是全面的，而绝不是片面的、被窄化理解的教育现代化思想，他的思想，尤其是教育现代化思想、民主化思想值得广大教育战线的同仁进一步深入地学习、研究和践行。相信这套丛书的推出也会对促进我国教育民主化、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推动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有所裨益。

储朝晖博士作为一名醉心于陶行知研究的陶研骨干，同时作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他为本丛书的策划、选编和联络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心思。他在海峡两岸和香港研究陶行知的成果中认真筛选，最终确定了这五本著作。我衷心地期待这套丛书引发人们对陶行知思想研究新的兴趣，激发人们学习和研究的热情，推动人们进一步深入钻研和践行陶行知思想。希望这套丛书惠及全国陶研战线的同人，从中受到启迪，同时激发出教育实践工作者创造出新的办学经验与教育经验，因为理论再完善，学术再精深，也永远不能替代生生不已的实践。

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今后陶行知思想的传播、研究与实践有赖于青年学者和青年实践者的努力，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使“陶花盛开”的蓬勃景象长存永驻。

朱小蔓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2011年9月

序二

2011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经过自1951年对陶行知批判30年后,1981年恢复陶行知名誉的30周年。中国古语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此时也正是陶行知研究一个新的起点。

值此之际,陶行知家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陶行知研究丛书》,具体负责编选工作的又恰是在30年前为陶行知正名那股解放思想潮流中迷上陶行知研究的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博士,应验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古谚。

这套丛书在选题过程中,自全世界范围内搜集筛选近些年写作的陶行知研究新作,其中一些是在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的作品,虽未选到适合条件的非中文作品,至少它足以反映这一时段世界华人社

会陶行知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概貌。

这套丛书收入的五本专著分别是：台湾学者曹常仁先生的《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香港学者何荣汉先生的《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以及大陆学者储朝晖的《多维视野中的生活教育》、吴擎华博士的《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谭斌博士的《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专著都有了，呈现出陶行知研究新的态势。

近30年来，陶行知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果，这套丛书是大量成果基础上的一片新芽，这片新芽显露出陶行知研究的新气象，各本著作资料翔实，写作规范，视野宽广，思考深入。尤其看到青年学者们成长起来，作为陶行知先生唯一在世的四子心情尤为激动，乐为序。并以陶行知先生诗句赞扬五位青年学者：世界将起变化，火把要换人拿，但愿天翻地覆，青年领着老大。

陶 城

2010年9月于哈尔滨家中

目 录

1	第一章	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1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
3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研究现状
11	第三节	研究视角及所解决的问题
14	第二章	陶行知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15	第一节	浸染乡里与性格气质的秉承
21	第二节	社会改良思想的确立
27	第三节	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40	第三章	乡村建设之路:晓庄学校

41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
47	第二节	晓庄试验:教育与社会改造
62	第三节	晓庄与民国政府的张力
65	第四章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66	第一节	陶行知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76	第二节	现代化的途径和实践
113	第三节	新教育推进现代化的困境
118	第五章	忧愤民族危机、思索民族解放
119	第一节	政治与论战
133	第二节	陶行知国外宣传联合抗日
148	第三节	抗战与教育
157	第六章	民主宪政之路的探索与实践
159	第一节	民主宣传与民主运动
170	第二节	陶行知与民主教育
177	结束语	
187	后 记	

第一章 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

历史的演进,多数时段是在同一社会范型内部运行的,但当各种内外条件氤氲积淀,达到某种临界点时,整个社会固有的形态便发生突破性变更。就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论,以 14—16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世界性的远航开其端,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着殖民扩张延伸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由分散走向统一,五湖四海的人类无论自愿还是被动,均渐次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西欧发端于 14 世纪,正式展开于 18—19 世纪的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的母体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学界通常称之为“早发原生型”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则是在“西力东渐”的过程中被迫启动,则称之为“后发次生型”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呈现了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斥又吸纳的错综图景,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化合反应。近代中国人既要完成文化

的时代性转换,也要完成文化的民族性因革。这两者间虽然蕴含着内在的统一,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呈现着互相矛盾、彼此抵牾的外观。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武力面前被迫签订一次次城下之盟,使得救亡在近代中国显得那样急切;同时面对国民的愚昧,启蒙、开民智也刻不容缓,救亡与启蒙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精英,在其实践社会改造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并反映着这种矛盾。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时代的全部复杂性。这种过渡时代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使命,不仅有文化的古今转化,还得面对文化上的民族性传承问题。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在本质上发生变化,而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在新旧交替之下,正在分崩离析。有思想、有感性的知识分子,在新旧和中西之间的取舍,在价值取向和个人前途的选择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扰。面对现实社会进退失据、辞受两难,对传统文化那种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两难选择。对国家和社会呈现出了深切思考、急切关注和貌似疏离的心路历程。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代有沐浴欧风美雨的人生历程,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中学和涉及声光光电、文艺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的双重身份。其知识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出多重性,其社会实践更显得异彩纷呈。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有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却又汲取西学某些成分而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有持“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有呼唤“全盘西化”实则根植于本土文化的胡适;有早年力倡西学,晚年回归东方文化的严复;有对东西文明不问好不好,只问适不适的陶行知,等等。他们生活在新旧双重的文化中: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双重文化的某些优点,得到祖先所得不到的满足;另一方面他们又被两极化价值体系所撕碎,感受到祖先难有的痛苦。这种人竭力企图挣脱传统的枷锁,因此不为祖先团体所容;同时他们又竭力拥护外来的优势文化,但不能入其堂奥,因此又不被优势文化所接受^①。他们生活在新旧两个社会中,在他们心灵深处,对新旧社会怀有去留之念、爱憎之感,徘徊在文化边缘所生的冲突中。

① (美)柯尼格,社会学[M],朱岑楼,译,台北:协志工业出版公司,1962:270.

这批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都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情绪,即使是那些激烈倾向西化的学人,实则理智向着西方,情感却执著东方,彰显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的二重表现。特别是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基本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君统和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其生活路径大体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故辙。他们接受了近代的新思想,而对和新思想有冲突的旧成分,却不能全然舍弃。他们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深恶痛绝,然而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批评和实验性的改造,却正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关切之深。

面对民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急速转型,社会秩序的紊乱,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各自的社会改造主张。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实践自己的社会改造,拯救民族危亡,探寻民族振兴之路。民国初年的文化改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化的大探索,国难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民主宪政运动,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社会改造主张,彰显出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心路历程。他们有的直接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社会改造之中,领导社会改造,成为社会改造的旗手;有的则深入社会实践自己的改造主张,成为社会改造的躬耕者;有的则潜心学术研究,使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成为其工具与武器。本文所探讨的陶行知则属于社会改造的躬耕者。综观陶行知一生,其始终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从事社会改造,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实现其社会改造的主张。陶行知的教育改造活动、乡村社会改造活动、现代化的社会改造及抗日救亡的社会活动和对民主宪政的追求,表明他确实是一位社会改造家。他一生根据中国的变化实施切合时代需要的社会改造,可以说其社会改造活动与时俱进。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陶行知怀着一颗爱国爱民的心,在社会生活中凭着自己的躬耕精神,以积极的社会实践对社会改造“表态”,而不是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研究现状

依照“历史研究只能在研究的历史中进行”这一学术研究通义,为了建立起一种开始新的研究行动的定向坐标,或清理好进一步探讨的工作场地,无疑需要对本文所探讨之问题的研究历史进行一番考察说明。

对陶行知的研究,从他逝世到 20 世纪 50 年代属于评价其“生前身后事”阶段,确立其在教育史及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论证其“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地位。1946 年《解放日报》对陶行知的的评价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一位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①。此阶段的研究几乎都以此为基准。1951 年到 1980 年,属于批判阶段,政治批判取代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最具有权威的判词是:他一生“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依靠)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他的教育思想则是“从始到终基本上都是贯穿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②。此后的研究差不多都围绕此基调展开。

1980 年至 1990 年期间,陶行知研究得以复苏,逐渐步入正轨,主要成就在于整理出版陶行知的著作,这为陶行知研究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基础。集大成者有:1984 年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的《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 1985 年 1 月至 8 月陆续推出了《陶行知全集》第二至第六卷(1992 年推出了第七卷和第八卷);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的《陶行知全集》10 卷本(后增至 12 卷),由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年陆续出版。

1990 年以后,出现了陶行知研究热的可喜局面,大量成果涌现出来,无论是观察视角的新颖性,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都超越了前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周洪宇主编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章开沅、唐文权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年)、周洪宇主编的学术论文集《陶行知研究与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余子侠著《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这一时期的陶行知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较 80 年代有所突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比较学以及解释学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丰富了陶行知研究的视角。如章开沅、唐文权从跨文化(cross-cultural)与文化交感(cultural interaction)着眼,把陶行知放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翔实的考察,对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们认为陶行知是一位锐意进取、爱满天下的教育巨匠和民主战士,还是一位风格独标、

① 解放日报,1946—08—12。

② 潘开沛. 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J]. 人民教育,1951,4(2).

别领风骚的大众诗人。^① 余子侠在《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中主要从教育家的身份、地位和言行来描画陶行知,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论述了陶行知通过教育完成文化时代转换的同时,也实现了文化民族性的因革。此外,周洪宇的博士论文《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华中师范大学,1992年)和余子侠的博士论文《双子座的光能:黄炎培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1997年),为陶行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时期学者对陶行知的探讨大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陶行知的中西文化观及其渊源、特点。多数学者认为陶行知的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的基础与渊源是中国古代墨家、儒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陶行知对中西文化采用“适用”与“不适用”来衡量,有别于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以及适中调和主义,是科学的文化态度。二、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态度。认为陶行知反传统旨在弃旧图新,除旧布新,对传统采取扬弃的态度。三、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辩证客观地分不同时期进行了不同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总体上是肯定了其“教育救国思想”。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论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从教育理论和方法、师范教育改造乡村、教育现代化、素质教育等角度审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陶行知教育思想现代价值研究”的最终成果《陶行知教育思想现代价值》一书,指出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实践性和人文性的特点,阐述了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渊源关系,昭示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肯定了陶行知对中国国情的分析,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方针、原则和方法,明确了在世界教育大潮中中国现代教育的走向^②。

本世纪陶行知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特点:陶行知研究趋于理性化和学术化,情绪化的色彩有所冲淡;研究的视角更加丰富,回到陶行知的历史世界的呼声得到了学者的认同。香港何荣汉在其新著《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用大量的史料论证了陶行知是一个基督徒,且是一位基督徒教育家,扩大了人们对陶行知研究的视野。在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何先生基本上达成了自己研究的目的:一、针对一种“讳莫如深,避而不谈”的态度,要在陶行知研究上

①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532—547.

②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做出突破;二、提出“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对近代化进程中陶行知这类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的关系,对基督教的接受,作重新的发现和评估的研究。诚如作者所言,当他发现大量关于陶行知的基督教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尝试重新建构其生平的时候,“便会重新发现一位基督徒教育家——陶行知,这不单是在文献搜索上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盲点,更是在诠释陶行知一生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日后对陶行知研究均必须考虑的角度。”^①余子侠用翔实的史料论证了陶行知确实是一个基督徒,认为陶行知“早年在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时所汲取到的基督教博爱和献身精神,以及与教会组织之间的特殊关系等,对他后来的人生旅程和事业建设,一直存在有缘无缘的影响和作用。”^②

吴翔从“新闻改革家”的角度研究陶行知。他认为陶行知的“新闻救国”与其“教育救国”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是“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思想”;陶行知希望“通过报纸影响上层少数资本家决策者的意志,将一两家大报引向进步,取得‘舆论引导之地位’,达到团结社会上层知识者、资产阶级力量的目的,好在科学文化上‘对民说话’,在政治民主权利上‘代民立言’”^③。胡晓风、陈廷湘认为:“陶(行知)在对新教育的探讨和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构想。他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现代化观念,实际上已较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心理习惯和人的整体素质全面的现代化转型的理论。同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努力探讨通过教育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途径。”^④以现代化作为贯穿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线索,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陶行知办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教育的现代化,而且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课题组著《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为从现代化视角研究陶行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文献基础。胡志坚的博士论文《自我统摄下的心理与行为:蔡元培、黄炎培和陶行知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视角来研究陶行知,论述了近代教育群体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最近

① 何荣汉. 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M]. 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30.

② 余子侠. 陶行知与中国的教会教育[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5).

③ 吴翔. 1931—1934年:作为《申报》新闻改革家的陶行知[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1).

④ 胡晓风,陈廷湘. 论陶行知以新教育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思想[J]. 社会科学研究,2003,(2).

几年的陶行知研究逐步越出了教育范畴,研究视野也趋向多元化,人们开始全面研究陶行知的历史世界。

与此同时,陶行知研究学术史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由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和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合编的《20 世纪陶行知资料索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年),将 81 年来(1919—2000)陶行知的研究文献汇成一册,从而较为全面地记载了陶行知的研究资料,是对 20 世纪陶行知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为陶行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林祥的《20 世纪陶行知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是对陶行知研究历史进行全面而系统考察的专著。它将陶行知研究分为“探索研讨期”、“纪念评价期”、“评判沉寂期”、“争鸣复兴期”、“发展实验期”五个时期,构建起了陶行知研究的网络。分期之科学,与 20 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实际吻合,勾勒出了 20 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历史轨迹。李刚的《历史与型范:陶行知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突破了综述体的陶行知研究史。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陶行知研究这个知识体系,一方面是政治社会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是陶行知思想研究发生、发育的结果,前者反映了陶行知研究的外在思路,后者反映的是陶行知研究的内在理路。前者是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后者侧重的是学术史的方法。”^①

陶行知研究也吸引了不少海外学者的注目,最早把陶行知介绍到日本的是牧泽伊平、户塚廉。早期日本的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大量宣传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但多属于一般性的叙述,尚未出现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甚远。二战后,陶行知研究在日本学界正式开始,涌现出了斋藤秋男、新岛淳良、市川博、世良正浩等颇有影响的研究者。斋藤秋男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刀江书院,1951 年)、《民族解放的教育》(明治图书出版公司,1961 年)、《陶行知评传》(劲草书房,1961 年)、《陶行知教育生活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出版公司,1983 年)等四部专著,并发表了许多论文,确立了其在日本和国际陶行知研究界的地位。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主要围绕三个课题展开:第一,对陶行知从“改良主义”转变成“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一发展过程的分析。包括按照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统区与解

^① 李刚. 历史与型范:陶行知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

放区之间的合作和对立等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推移,分析陶行知与师生和朋友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从晓庄师范时代到他晚年的大约 20 年时间中的发展和停滞,及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影响;第三,描述陶行知作为“大众诗人”的一面。《陶行知教育生活理论的形成》是集斋藤秋男多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力作,其研究思路是:以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为研究中心,以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为主攻方向,以“民族土壤的回归”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把陶行知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格斗的过程”来把握,他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接起来的,而是以“民族土壤”这种中国性质的东西为媒介连起来的。换句话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内在克服杜威理论的过程”。可以看出,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到,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形成了一个“斋藤秋男模式”。其研究是以重建日本新教育为归旨,是对二战以来只停留在全面地接受杜威理论还是完全否定上,并没有在日本的“民族土壤”里克服杜威理论的日本教育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看,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都是颇具意义的,代表着这一时期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最高水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日本陶行知研究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研究者,牧野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第一个对“斋藤秋男模式”提出异议的学者。他认为斋藤秋男分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基本是有效的,陶行知留学美国,受杜威理论的熏陶,回国后他的思想确实是在不断克服杜威的理论,但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并以此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起点,却值得商榷。他认为,斋藤秋男所论述的只是杜威理论对中国教育的有效性,而不是陶行知的思想主体。在“斋藤秋男模式”里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的必然性不是分析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前提条件。他忽略了贯穿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之前后,克服杜威理论界限的必然契机。因此,他不会不说陶行知克服杜威理论尽管必要,但不是必然。这一点正是“斋藤秋男模式”的不足之处。牧野笃认为,陶行知不是回到“民族土壤”里去,“民族土壤”始终在陶行知的内部。由此认识出发,牧野笃先后发表了《试论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基本构造》、《关于陶行知“工学团”运动共产党同体的考察》、《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学时代对王阳明思想的解释与吸收》等论文,从